

一個圖書館員的戰爭

臺灣作家，旅居瑞典 | 陳文芬

2006 年剛來瑞典那年，我看過哈睿·雅甫（Harry Järv）的電影想著總有一天要寫他的故事讓我的同胞知道瑞典的圖書館界出了這麼一個大英雄。

16 世紀歐洲的宮廷畫家阿爾博欽托畫出一張審美趣味奇特的「圖書館人」，畫中人是一個由書籍構成的。他的臉頰跟嘴脣是袖珍書做成的，那個時代的袖珍書通常是祈禱文，畫中人的右手臂是一本沈重的對開本，他頭上的書頁翻開，很像一個皇帝的頭冠，翻開的書頁依稀能辨識的字體不是印刷字體而是手寫。受到這張畫作的啟發，圖書館員在真實的生活當中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或者圖書館員如何啟發社會就成了永遠可以說下去的好故事。譬如大文豪歌德原來就是一名圖書館員，他評論他不喜歡的人會說：「要是那個人是一本書，我不願意讀。」奠定現代圖書館基業的大英圖書館長帕尼茲（Antonio Panizzi）是一個流亡的義大利革命家，當他來到倫敦時，居然還不會講英語；美國最有名的圖書館學家專家杜威年輕時學校失火，為了從悶燒的圖書館搶救書籍，吸入大量濃煙，醫生判斷他最多活兩年，早死的威脅促使杜威一生對如何節省時間充滿興趣，他創造的一系列的標準化方法，成為圖書館分類管理的先驅。

我喜愛阿根廷作家波赫士的佳句：「世間要是有一個天堂，那就是圖書館」。波赫士患有家族遺傳的眼疾，他老來終於當上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眼力已近全盲，無可奈何的他長歎一聲：「唉，我就像個被焚毀的亞力山卓圖書館。」波赫士說得真好。而我所知道的哈睿·雅甫就如同波赫士，如同阿爾博欽托畫上的圖書館人，他們自己就是一座圖書館。

我從哈睿·雅甫主編六名瑞典專家合作撰寫一千頁的大書《人類的記憶》才知道古代的尼尼微、亞力山卓、羅馬、浙江寧波「天一閣」等城市的圖書館傳奇。《人類的記憶》書名出自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名言：「圖書館是人類唯一可靠留存的永恆的記憶。」埃及的亞力山卓圖書館從建成到焚毀的傳說故事特別多，依靠一些書籍描述圖書館內部的情景，通風的開放式柱廊或有頂蓋的走廊，室內堆疊書卷，室外的遮蔽處有學者聚會討論。柱廊使人想起柏拉圖在成蔭的樹林逍遙的授課，這些柱廊後來就成為羅馬人圖書館建築設計的標準元素，就像現代的圖書館有放桌椅的閱讀室，也有廊柱的特色。

《人類的記憶》2008 年由芬蘭一家專門出版瑞典語的出版社出版，主編哈睿·雅甫交出五千頁長稿，出版社要求他精簡到一千頁，精美裝幀彩印所費不貲。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留存的圖書館於現在的敘利亞，公元前二千年用泥板為書寫工具，用尖條在板子上寫字，以後烤乾，利於保存，現存約有一千八百部版本，五千塊泥板。近年敘利亞的戰情緊張，各方焦急關注敘利亞的古文物遭致暴徒破壞的情



· 哈睿·雅甫主編《人類的記憶》

況，想來這個圖書館也是關注的主題。

世界上最有名的古代圖書館亞力山卓圖書館，藏有七十萬卷羊皮卷，傳說公元 640 年阿拉伯人打到埃及將羊皮卷全部送進公共浴池的爐子燒了半年才燒完。但是自古以來喜愛藏書屬於伊斯蘭文明成員的阿拉伯人是不是真的這樣做了，倒不必真的相信。古時的圖書館員是什麼樣兒這不好說，波斯人有一個喜歡讀書的將軍，出門旅行帶著四百匹駱駝載滿書卷，駱駝隊伍就是圖書館，想像他們怎麼分類挺有意思；可以肯定希臘公元前二百年（大約中國的漢初）開始有了最早的圖書館員，他發明一種圖書館的系統，區別純文學的戲劇跟法律哲學歷史，修辭學醫學數學自然科學，以及其他。這樣的分類方法跟中國漢朝學者劉向的分類方法有些相像之處。漢書的「藝文志」使用的就是劉向跟劉歆的分類方法。

哈睿·雅甫撰寫亞力山卓圖書館的長文，專長在拉丁文的烏普撒拉大學圖書館長撰寫古代羅馬的書商故事跟羅馬圖書館，而伊斯蘭文明在世界圖書館的發展扮演貫穿東方與西方的傳播角色，這本書亦有幾篇文章詳細介紹。哈睿·雅甫還撰寫 17 世紀初瑞典在德國、布拉格打仗，從那兒搶來很多文物，17 世紀的瑞典藏書家是本書有趣而具諷刺意義的主題。封面使用阿爾博欽托的那張「圖書館人」畫作，此時我才赫然發覺就是 17 世紀搶來瑞典，目前收藏於斯德哥爾摩郊外不遠的一座宮殿。古代的君王建立的圖書館目標太過明顯，往往在戰爭當中遭到破壞搶奪焚毀，而私人圖書館有時候在歷史上起了更大的作用，這本書也是西方研究圖書館的著作當中罕見的介紹中國私人藏書樓天一閣影響了清朝的君王藏書的方法，由漢學家馬悅然撰寫。

主編在本書的開宗明義指出：「越重視保存知識的人往往就是那個消滅圖書館破壞者，這是人類歷史上一種很奇怪的經驗。」西方古代有影響力的圖書館都是公立的皇家的，中國的宮廷圖書館只有皇帝可看書，缺乏羅馬自從上層社會有公共浴池，圖書館也就興起的那種文明。然而明朝的私人圖書館文化卻很豐富，最大最好在浙江寧波。「天一閣」主人范欽早就考了進士，到處旅行買書抄書，中國藏書家多半只藏善本，范欽最想要地方志、明朝的宗譜跟科舉有關係的資料、個別的作家作品。他專門收集個別朝代的地方志，自漢朝開始有地方志，研究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一個地區有名的風俗習慣、地理建築相關的知識尤其是橋樑的興建，氣候變化譬如地震，社會動盪譬如饑荒，盜匪林林種種。「天一閣」有 435 個明朝地方志，比明朝官方目錄收集還多，1949 年的記錄收有 266 個有些甚至是手稿，家庭宗譜也始於漢朝，現藏約二千卷。

范欽 55 歲退休了。開始建造藏書樓「天一閣」選在月湖旁邊，木造建築兩層，上層一大房子，底下六個房間，象徵著「天一地六」。藏書樓有許多建築周圍環境的考慮，臨近湖水，還有一池子，砍掉附近的樹木，有許多嚴格的家規防火入內不得帶酒點燈。防患火災，設想周到。樓上僅有書箱子，沒有書架，箱內置香草防書蠹。

范欽死了，分家產時兒子決定書籍不能分散。他們拿出一千兩金子放在一邊，一個選書，

一個選錢，保持藏書的完整。他的兒孫按照范欽的意思保護書院，大門有三個鎖，分三房來持鑰匙三者同時合一才能開鎖。沒有得到許可帶親戚進入藏書樓，罰三個月不能祭祖，帶外人進書院，罰一年不能祭祖，偷竊典當藏書者開除家族的地位，一輩子不得回家，親戚們只有 7 月 7 日可以進藏書樓幫忙曬書。1637 年文學家黃宗羲於以外人身份進入編寫一份目錄。他說，收藏書不易，最不易將書藏起，終不散落。

清朝乾隆皇帝拜訪「天一閣」以後，對皇帝做「四庫全書」的想法有所啟發，皇家的圖書館文淵閣採用與「天一閣」相同高度的書架形式。

鴉片戰爭英國軍隊打到天一閣，他們竊走有軍事意義的明朝地方志，1840 到 1911 年之間可能有一千六百部書籍遺失。1924 年有上海的書商教唆土匪去圖書館偷書。最大的天一閣目錄為阮元所作，阮元也是音韻學家，1804 年以經史子集分類法編目錄，有四千多筆五萬四千多卷，描述非常詳細。到了 1932 年只剩下八千卷，數量銳減，更顯保存不易。

無論東方西方，大學的建立才對現代圖書館藏書做出真正的影響。公共圖書館 1693 年巴黎皇家圖書館已公開使用，當時英國倫敦遠遠落後於巴黎的圖書館。1831 年從義大利流亡來的年輕革命家帕尼茲有 34 歲，1836 年他在大英圖書館做低階圖書館助理員，1836 年圖書館的高層來了一群人想考察圖書館員的知識水平，6 月 7 日這一天他們忽然對帕尼茲感興趣，出了一份考題。把圖書館員需要的知識非常詳細的包羅在內，這篇考卷收錄在《人類的記憶》這部大書顯得特別有意義，馬悅然說他把所有的考題都讀過就能懂得帕尼茲坐在那兒一整天當場揮就 20 頁的回答，所有歐洲圖書館的知識他都知道可見他是一個多麼有學問的人。帕尼茲很快受到拔擢成為大英圖書館館長，在他的努力之下使倫敦圖書館迎頭趕上巴黎世界之都。

言歸正傳，現在哈睿·雅甫的故事登場了。

1921 年哈睿·雅甫出生在芬蘭的中西部，那兒的居民多半是芬蘭－瑞典人，18 世紀瑞典、芬蘭為同一個國家，他們從瑞典遷徙芬蘭開墾居住，一直保持瑞典語的母語，也會說芬蘭語。哈睿的爸爸是農民，哈睿喜歡讀書，少年時已經把他家附近的圖書館的書讀完。他喜歡駕船，打算將來弄一艘船遠行，他爸爸覺得太冒險，告訴他要是打消這個念頭，就讓他讀大學，哈睿於是打定主意專心讀書。

芬蘭人的求學時間較長高中畢業 20 歲，1939 年，哈睿 18 歲，蘇俄大舉侵略芬蘭，芬蘭所有青壯男丁立刻走入戰場保衛國土。哈睿學習軍事的時間雖短已勝任少尉軍官，帶領一批年紀相仿說瑞典語的高中士兵作戰，他們的任務是趕上蘇俄軍隊戰線的後防部隊，進行突擊檢查，切斷他們戰線的尾巴。打仗跟工事防禦以外的餘暇時光，哈睿帶著所有的士兵一起讀書，哈睿當他們的老師，晚上一起讀歷史、哲學、語言，他什麼科目都教，士兵們也心無旁騖學習各項學科。

哈睿參加 1939 到 1940 年的戰爭，接著又參加 1941 到 1943 年俄國第二次侵略芬蘭的戰爭。

1943年他們堵截蘇俄軍隊遭到強烈的反擊，哈睿踩到俄軍埋伏的地雷重傷倒下，哈睿決心犧牲自己命令所有的士兵撤退，留下他一個人持機關槍掃射護衛同袍逃走，士兵們撤退了一段路，想起遺棄哈睿而眾人苟活下來實在太不成話，一群人又奔回原地激烈搶救，最終把他送進軍醫院做手術。哈睿活了下來，壞了一隻腳，裝上義肢，他復原後再上戰場，打完第二次戰爭，1944年芬蘭境內又有一次戰爭，他也參戰到底。哈睿以驍勇善戰的成就榮獲五枚功勳戰士勳章，幾乎囊括所有戰士能獲得的榮譽，有四名將軍聯名推薦他得到芬蘭總統的功勳騎士，由總統來決定是否頒發，總統最終沒有頒給哈睿，總統好像知道真實的哈睿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是那種追求知識至上不受軍中紀律支配的那種英雄。

哈睿1945年搬到斯德哥爾摩生活，很早就開始做圖書館員，在烏普撒拉大學攻讀文學、哲學、藝術史，考了第一個博士，1973年得到名譽博士，1958年開始在皇家圖書館工作，做到手稿部主任、代理館長。他寫作的論文與目錄很多，1961年寫作數百頁的卡夫卡文學作品目錄，收錄十七種語言五千筆卡夫卡的著作出版，國際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最重要的一份研究目錄。他反對瑞典「一般人」解釋卡夫卡的看法。有一個哥德堡有名的瑞典電影導演，就用左派的共產黨的精神來解釋卡夫卡，他就非常生氣任何用意識形態的方法來看文學作品，他認為只要讀者懂得卡夫卡跟女人之間微妙的關係，讀者就會懂得卡夫卡的性情品格，讀懂文學作品並不需要了解一種政治的主張與理想。他研究的領域涉及文學、圖書館、軍事歷史、心理學哲學，他也是一個反對戰爭的人。

他從1978年到1997年主編瑞典三份文化刊物，編輯部只有他一個人，他從來不拿編輯費，總是將申請來的刊物經費給予作者，付給作者「作家協會」標準的稿費，他什麼都做，收集資料、拍照、校對、看清稿，他總是強調文字跟照片圖像相得益彰，務必做到盡善盡美。他在皇家圖書館負責手稿部，在他手下手稿部收藏的數量倍增，他常常自己動手去找。2010年1月我在哈睿·雅甫的葬禮聽他的朋友說故事，哈睿去兒童文學作家林德格倫家裡作客，林德格倫是哈睿的好朋友已贈給圖書館不少手稿，哈睿問她：「家裏還有手稿嗎？」林德格倫說：「閣樓上還有呢。」，哈睿立刻上樓翻箱倒櫃將所有的手稿找出來滿載而歸，送進圖書館。1975年瑞典政府想改革高等教育，指點要皇家圖書館館藏書籍跟高等教育有關係的部分，全分給斯德哥爾摩大學，政客領導館藏、外行領導內行，哈睿·雅甫火大了，以他參戰功勳戰士的精神徹底鬧個厲害，斯德哥爾摩大學本身的學者像馬悅然也參加投書抗議，政府不得不讓步，事情才落幕。

哈睿·雅甫寫作五十多本書，他還是一個非常傑出的翻譯家，他翻譯的語言包括英文、德文、芬蘭文，拉丁文。他對翻譯的藝術的看法跟馬悅然一致。他翻譯馬拉莫、D H 劳倫斯，藍波、他寫羅馬詩人範濟留斯的死亡，古代詩人作品不容易翻譯他翻譯的非常好。馬悅然1975年選入皇家歷史考古學院院士（通常簡稱皇家人文科學院）1981年他想推薦常常跟他在刊物約稿的哈睿·雅甫進入人文學院，他佩服哈睿·雅甫的知識跟廣闊的視野，這時候人文學院同事告訴馬

悅然，哈睿·雅甫是一個極度不受體制約束的人，他可能看不上多數是學究型的教授院士們，恐怕不願意來學院開會。1981年哈睿·雅甫選入人文學院，入選那年到2009年，他每週二高高興興來開會，以後總是跟馬悅然坐在同一張五個人的桌子，一起吃了二十幾年的學院晚飯。

哈睿·雅甫2009年12月27日過世，馬悅然為他所作的評論形容他的一生具備瑞典語的四個K，我譯寫這四K的中文意義：「知識、資格、質量、文化」，他是一個文化巨人。而哈睿生前謙虛地說到自己有三樣足以自豪的專業，一是戰場上的近身肉搏打鬥，二是編輯文章時使用括號，他知道當用必用之處，三是他擅長精良的攝影品質拍照的方法。哈睿他自認是平民教育家，散文家，無政府主義者。

如此叨叨絮絮寫來，最後我想帶領讀者來到哈睿·雅甫的戰爭電影。當哈睿·雅甫埋首於圖書館工作時，他已發表了幾本著作，描述他親身經歷的戰爭。他在戰爭當中寫了許多日記，使用瑞典製造精良的照相機拍下許多珍貴的影像，他描寫他們在芬蘭森林駐紮建築壕溝與俄國軍隊短兵交接激烈的情況，更有年輕高中士兵生活的點點滴滴。著作發表以後電影製片找上哈睿想將故事搬上大銀幕。

哈睿自己擔任電影導演、寫腳本，電影片名《站在前線的後頭》找了一批能打仗的真正的軍人來做演出，在森林裏建造戰士生活的小木屋，砍下白樺樹割下樹皮樹幹做工事的防禦。2014年是第一次大戰的一百年紀念，那一次的戰爭許多英國貴族的子弟吃足了苦頭，他們大半的生活都在壕溝地下層度過，濕氣過重損害雙腳的健康憂鬱返鄉。傳說俄國芬蘭戰爭冬季氣候零下五十二度，哈睿跟士兵都是農民子弟他們懂得森林與農業。把白樺樹皮貼進壕溝裏頭防濕禦寒，士兵在身體套上一層防寒油布。小木屋有著年輕戰士的書桌跟小書架，那個角落是戰爭時期的微型圖書館。二十幾個士兵的床成兩排架在小屋當中，中間的空位是大家吃飯的桌子，記得有一則小插曲大家洗了或者沒洗過的衣物、襪子晾在床沿的曬衣繩子，不知誰的襪子掉落在一鍋高湯鍋，鍋湯煮了又煮，大家覺得日子真是越來越難過，食物這麼難吃。等一鍋湯都見底了，才瞧見這隻闖禍的襪子。

電影以樸素的黑白影像保持哈睿著作的原貌，不僅描述戰爭，也描述戰爭當中一個獨立的個人保持自己的思想，憑藉著一盞夜晚的小燈在書桌前熒熒發光。士兵們在蒼白茫茫的森林當中，擁有完好的心靈宇宙，整個生死交關的戰爭成為一種現實的外形壓迫，內心在知識追求的大海定錨，像一艘小船隨海潮飄搖卻堅定能遮風避雨，完成一場驚濤駭浪的旅行。

除了哈睿·雅甫本人世界上沒有其他的導演比他更適合拍攝這部電影。電影拍到哈睿踩到地雷倒下，戰士們撤退又回頭搶救哈睿。電影有雅甫本人現身，雅甫老年時英姿猶在，仍有一種梁山好漢的本



· 哈睿年輕時在戰爭中的留影。



· 哈睿曾經得到勳章的照片。

色，他說：「昏迷以後我醒過來想了很多事情，想到死亡想到將來怎麼辦，想到我的卡夫卡，書讀到那一頁了，書還在我們森林裡的小木屋。」畫面一轉冬日已盡春日到來，林間多少白樺樹黑白相間的樹蔭，輕輕搖曳。

哈睿·雅甫告訴悅然在這部電影所有的壕溝戰役、軍事布陣以及各種裝置都完成擬真，唯一讓他覺得稍稍有一點遺憾的是，俄國軍隊的那場幾乎令他致命的戰役，起頭俄軍從山坡上的一棵巨大的杉樹佔據制高點的形勢，突襲放冷槍打下來，以至於當時哈睿的隊伍招架不住，電影實景怎麼樣都不能找著高地的杉木，最後拍攝制高點始戰於一棵松樹，「實在沒有辦法了！只有這一點美中不足。其他堪稱完美。」

2009年底哈睿·雅甫過世，次年一月初在斯德哥爾摩森林墓園舉行葬禮，葬禮辦得簡約隆重，有一個年老的戰士身著西裝，胸前別滿整排的戰功勳章出席葬禮，像電影人物現身，像歷史人物重回現實，葬禮傍晚完成，冬日的雪光皎潔猶如一張書頁。

馬悅然感言：

Harry Järv 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我相信他在寬泛閱讀時肯定會遇見曾國藩的名字，19世紀中國最偉大學者與戰士之一。我也相信 Harry Järv 會欣賞曾國藩的著作，如《曾文正公嘉言鈔》和《曾文正公學案》，要是這些重要的著作譯成外文作品，他讀了一定深受感動。

Harry Järv 跟曾國藩有很多共同之處。兩人的背景是一樣的，父親都是淳樸的農民，兩人終生追求學問，有非凡的勇氣和正直，兩人皆毫不猶豫地營救國家之難。這兩位大人真的值得佩服的。